

## 從歷史風土探討日本「國家意識」的建構

林呈蓉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 摘 要

本文試圖從歷史與風土的角度，回顧日本社會「國家意識」思考的崛起，以及如何走向「國家認同」的決策過程。太平洋戰爭之後，戰爭的挫敗促使多數日本國民經常會把「國家意識」與「戰爭」聯想在一起，有些時候「愛國」的觀念甚至成為日本社會的一項禁忌。伴隨日本經濟的全球化發展，以及東亞外交上的詭譎多變，如何重建國民的「國家意識」，將成為二十一世紀日本社會的一大課題。

**關鍵字：**國家意識、歷史、風土

## 壹、前言：從「お国は何処ですか」到「お国のために」

對四面環海的島國而言，海是人與人之間隔閡的障壁，但也是連結人與人之間的一條通路。日本列島是由三千七百以上的大小諸島所結構而成，透過海洋的存在，不僅把這些島嶼連結在一起，也促使與亞洲大陸、東南亞諸島等周邊地區之間人流與物流的發展（網野善彥，1996：50-51）。日本兩千年歷史，透過海洋的機制，在攝取海外先進文明的同時，外力也可能藉由海洋的通路侵犯列島。在「海內 vs. 海外」的相對認知下，「國家」意識於焉產生。

另一方面，史料上有關日本最早的紀錄，始於一世紀時候的《漢書》〈地理志〉，上面記載「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余國，以歲時來獻見云」<sup>1</sup>。由此可知，日本列島上原本是一個部落國林立的社會。這種現象到了三世紀前期，經過部落國之間的相互傾軋攻伐，而形成了以「邪馬台國」爲中心所統合的三十個小國聯合政權<sup>2</sup>。爲了取得來自亞洲大陸的鐵資源與先進文明，三世紀後期，在北九州與近畿平原一帶，建構出以邪馬台國爲主體的「大和」政權（五味文彥、高埜利彥、鳥海靖，1998：31）。到了六世紀，面對朝鮮半島的紛亂局面<sup>3</sup>，與內部王統斷絕的危機，大和王朝試圖引進隋、唐等先進知識，以強化中央集權的力量（五味文彥、高埜利彥、鳥海靖，1998：45-50）。於是，大和政權在豪族環伺的現實中，建構出「中央 vs. 地方」之都鄙意識的社會氛圍（司馬遼太郎，2003：12、251-53）。作爲建構中央集權國家政策的一環，西元 620 年日本已經開始編纂中央層次的國史<sup>4</sup>，同時地方層次的分國概念也仍舊深刻地烙印在民眾的腦海當中。

---

<sup>1</sup> 《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鼎文書局，1658 頁。

<sup>2</sup> 《三國志》卷三十〈魏書 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中華書局，854 頁。

<sup>3</sup> 大和政權在鐵資源等先進文明的取得，主要是來自伽耶。西元 562 年，大和政權在朝鮮半島南方的據點伽耶諸國被新羅合併。

<sup>4</sup> 根據口傳的〈帝紀〉、〈舊辭〉，編纂了《天皇記》、《國記》、《臣連伴造國造百八十部并

西元 701 年，日本史上首部的律令法典被整備完成。透過律令的條文內容，反映出代表朝廷中央最高存在的「國家意識」。另一方面，爲了強化朝廷統治的正當性、以及國家形成的由來，中央的大和政權也積極編纂國史<sup>5</sup>。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政權在編纂國史的同時，也要求各地方分國，針對地方的鄉土特產、山川原野命名的由來、特殊古老的傳承等筆錄下來，編撰成地方的《風土記》<sup>6</sup>（五味文彥、高埜利彥、鳥海靖，1998：83-84）。從歷史書的編纂中清楚顯示，「地方分國 vs. 統合國家」，兩種不同層次的「國家」概念，在一千年前的日本已經並行並存。

這種二元並存的「國家」概念，即使在現代的日本社會，依舊在民眾腦海中根深蒂固。日本人遇到初次見面的人，習慣性地會尋問對方老家是哪裡，以日語來表現是「お国は何処ですか」？江戶時代的人可能回答的是「薩摩國人」，但因行政區劃的變遷，近代以後原本的薩摩國人便回答自己的出身是「鹿兒島縣人」，因爲舊薩摩國位處於今鹿兒島縣西部。很明顯地，「お国は何処ですか」這裡的「国」所指的是地方層次的「国」。

西元 1940 年代，太平洋戰爭打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在「爲了祖國」的大義名份下，民眾必須捨棄小我之私，以完成大我之益，以日語來表現就是「お国のために」。此時的「国」則是指統合型態的近代國家的「国」。

換言之，在日本社會中，千年以來兩個不同層次的「國家」意識同時存在民眾的心底。伴隨時代的推移與海內外環境的變化，特別是近代以後當連結日本列島的交通網整備之後，一般民眾對「國家」的視點開始擴大，從「地方分國」意識逐漸進階到「近代國家」意識，甚至衍生成「小國主義」與「大國主義<sup>7</sup>」之間勢力的消長關係（田中彰，1999：73-95）。值得

---

公民等本記》，但已散佚。

<sup>5</sup> 西元 712 年完成《古事記》的編纂，西元 720 年又完成《日本書紀》的編纂。包括《日本書紀》在內，在八世紀到九世紀的兩百年之間，陸續完成了《續日本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日本文德天皇實錄》、《日本三代實錄》，合稱爲「六國史」。

<sup>6</sup> 目前保留最完整的是《出雲國風土記》。

<sup>7</sup> 根據中江兆民的說法，「小國主義」是憑藉國際公法運作的理想主義路線，而「大國主義」是指走海外膨脹的國權主義路線。

注意的是，對大多數民眾的日常生活而言，在「國」的概念上，地方分國的印象應該是遠超出統合國家而來得強烈。

以下，本文試從民間學的角度，把日本歷史上統合國家「國家意識」崛起的發展脈絡做一整理後，再歸納出其凝聚國家認同之關鍵所在。

## 貳、前近代「國家意識」的形成

### 一、「華夷體制」下「國家意識」的成形

爲了獲取亞洲大陸的先進文化，早在一世紀時，作爲統合國家的日本，已被編組在當時東亞的國際秩序「華夷體制<sup>8</sup>」之下。然而，史料上顯示，相較於周邊其他國家，日本一向是不安於「華夷體制」之下。相對地在仿效隋、唐帝國，完成律令國家的建構之後，更以「小中華」自居（林呈蓉，1998：5）。根據《令集解》<sup>9</sup>的解釋，日本律令是以日本爲中心，把海外國家分爲鄰國、蕃國、夷狄等三大類。中國（大唐）被定位爲鄰國；而朝鮮半島的新羅則被定位爲蕃國<sup>10</sup>，即關係不緊密的朝貢國；至於中南半島的墮羅、印度半島的舍衛、本州東北的蝦夷等則被定位爲夷狄，不入朝聘之列（林呈蓉，1998：5）。

西元 894 年，日本鑒於大唐國發生安史之亂，國內疲弊，在有遣唐使經驗的菅原道真建議下，停止了遣唐使的派遣（五味文彥、高埜利彥、鳥海靖，1998：102）。從此以後，日本的對外關係上，雖然民間的交流仍舊活絡，但官方的交流已全面停止。這是日本試圖脫離「華夷體制」自立的開始，同時也奠定十至十一世紀「國風文化」時代的基礎。

---

<sup>8</sup> 以亞洲大陸的「中華」爲中心，透過冊封的上下關係，把海外諸國編組到「中華」所認可的國際關係裡。

<sup>9</sup> 新訂增補國史大系《令集解》前編，吉川弘文館，1985年，91頁。

<sup>10</sup> 新訂增補國史大系《令集解》後編，吉川弘文館，1985年，774頁。

事實上，日本試圖脫離「華夷體制」尋求自立，是有脈絡可循的。早在西元 607 年，聖德太子所派遣的遣隋使小野妹子，帶給隋煬帝的國書就寫著「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sup>11</sup>」，乍見下日本的對外關係仍被定位在「華夷體制」的架構內，但不容置疑地，骨子裡卻試圖以「對等外交」的姿態展現自我。西元 663 年的白村江之戰（白江口之役），日本與唐·新羅聯合軍的對決（五味文彥、高埜利彥、鳥海靖，1998：56），是另一次試圖擺脫「華夷體制」結構的具體展現。

西元 1274 年，大元國正式派遣大軍攻打日本（文永之役）之前，曾先後六次遞交國書給日本，要求通交，但都被日方給斷然拒絕（林呈蓉，1998：75-76）。「文永之役」之後，面對大元國政府所派遣來的使者，日方乾脆以革殺使者來表達拒絕通交的強硬態度（林呈蓉，1998：77）。然而，這種不願臣服於「華夷體制」之下的嚴正態勢，在十四世紀中葉大明國的「政經不可分」外交原則下，迫使日本重新回到「華夷體制」的架構下。爲了進出大陸市場，當時政治的實權者室町將軍以「日本國王臣 源」的權宜名號，對明進行「勘合貿易」（五味文彥、高埜利彥、鳥海靖，1998：179）。日、中之間透過一個虛幻「日本國王」的共識，有效進行雙邊的經貿關係（林呈蓉，1998：120-33）。但是，這個雙邊關係只是一時的權宜，隨著明朝政權的勢微便瓦解了。

十五世紀後期到十六世紀的（1467~1598）織豐時代，日本列島上舊有的政治倫理已經蕩然無存，代之而起的是一個講究「實力主義」，社會底層勢力抬頭的時代（五味文彥、高埜利彥、鳥海靖，1998：183-86）。日本國內在一股「下剋上」的風潮下，在對外關係上，除非亞洲大陸有強權出現，否則不可能再去接受一個講究上下關係的「華夷體制」。豐臣秀吉統合日本列島上大部分的地區之後，試圖建構一個以日本爲中心的東亞國際秩序。他以實力者自居，要求位在印度 Goa 的葡萄牙政廳、菲律賓馬尼拉的西班牙政廳、台灣的高山國、朝鮮王國等臣服入貢；另一方面，爲

<sup>11</sup> 《隋書》卷八十一〈列傳 東夷〉第四十六，洪氏出版社，1974 年，1825 頁。

了解決封地不足的問題，甚至不惜對明出兵，發動領土擴張的戰爭（五味文彥、高埜利彥、鳥海靖，1998：226-28）。因此，織豐時代也是日本主動挑釁傳統「華夷體制」的開始（信夫清三郎：第一卷，1990：10）。

值得注意的是，從西元 1543 年葡萄牙人來到日本九州南方的種子島之後（五味文彥、高埜利彥、鳥海靖，1998：217-219），也改變了日本人的世界觀。在日本人眼中，中華政權已經不是無上至高的存在，傳統「華夷體制」下的「天下」，逐漸無法與「世界」畫上等號。另一方面，歐洲社會透過基督教與國際法的法理原則，尊重各國獨立主權的「西歐國家秩序（Western State System）」，也正在成形當中（信夫清三郎：第一卷，1990：16）。

## 二、「大君外交」、「鎖國體制」與近代「國家意識」的萌芽

江戶初期，幕府透過外交書簡的宣告，在對外關係上打出了 1600 年代的「大君外交」路線。一般都把「大君外交」體制解讀為日本脫離「華夷體制」而獨立的一種宣示，或說是「日本型華夷體制」的確立（Ronald P. Toby, 1990: 77-78；荒野泰典，1989：162）。幕府將軍為了避免陷入過去被海外視為是「日本國王」的尷尬局面，在對外關係上便以「大君」自稱，並令儒官林羅山草擬國書，向海外宣告「日本國主源家康已統一全國」，更強調「其教化所及之處，朝鮮入貢，琉球稱臣，安南、交趾、占城（以上全屬越南）、暹羅（泰國）、呂宋（菲律賓）、西洋、柬埔寨等蠻夷之君長酋帥，無不分別上書輸貢」（信夫清三郎：第一卷，1990：11）。

然而，在西元 1624 年到 1641 年之間，幕府卻逐步完成所謂的「鎖國體制」。「鎖國」是概念上的誤解<sup>12</sup>，事實上是幕府在禁壓基督教，以及試圖獨占海外情報與經貿利益的一個專權手段（五味文彥、高埜利彥、鳥海靖，1998：245-47；信夫清三郎：第一卷，1990：23）。面對海外局勢不斷朝往世界國際秩序（World State System）的方向擴展，日本社會憑藉著

---

<sup>12</sup> 「鎖國」一詞是出自於德國外科醫師 Engelbert Kaemfer 的《江戶參府紀行日記》，1801 年志筑忠雄翻譯 Kaemfer 的著作時，首次以漢字「鎖國」來表現。

海洋的天然屏障，開始過自給自足經濟生活的同時，日本列島內也開始有了「國家意識」思考的萌生。

十七世紀的儒學家熊澤藩山，便以著作《集義外書》表達透過「身土不二」概念<sup>13</sup>的落實，達成政治得以自主的期待。同時期的山鹿素行也在著書《山鹿語類》中闡述了相同的理念。這些訴求以一言蔽之，在捨棄外來物資的情況下，日本社會可以過著不與海外有所糾葛的「自給自足」生活。熊澤藩山以「少而不足用」的生絲與棉紗為例，強調「即使中國絲綢不再運入，視政治情況而定，本國所產亦能滿足需要」。山鹿素行也同樣強調「自給自足」的概念，並清楚指出「以我天下之富，土地之廣，不需仰賴外夷之物，即可自足」（信夫清三郎：第一卷，1990：36-37）。爲了鎖國體制的完成，在不允許海外物資大量流入的情況下，便須仰賴國內物資的有效利用以維持生活之所需。以飲食生活為例，在鎖國體制下江戶時代衍生出以海鮮與蔬菜爲中心的飲食文化，套用現代的語彙，就是在地生產在地消費的「地產地消」觀念<sup>14</sup>。

鎖國體制的思考原點，在經濟上，從過去以「國外無用之物，易我國有用之材」，轉型爲國內經濟上的「自給自足」；在政治上，當經濟發展不再仰賴對外貿易時，貿易在被有效控管的情況下，以日本爲中心的對外關係便得以建構起來（信夫清三郎：第一卷，1990：38）。而促成鎖國體制思考的契機，則是天主教的宣教勢力與北狄（滿州人）對中國全境的佔領。面對海內外局勢的紛擾，熊澤藩山開始思索日本整體的安全。然而，在熊澤藩山的腦海裡，近代「國家」的思考尚未成形。同時期的山鹿素行，則從日本的「安全保障」，進而思索日本的「自我」，從日本的神道教推演出一套以日本爲「中央之國」的日本主義。天皇的「萬世一系」以及得以

<sup>13</sup> 「身土不二」的用語出自於十四世紀中國的佛教書中，強調人的身體與所居地的風土密不可分，因此從養生的觀點來看，居住地三里四方，或四里四方的鄰近地區所培育出的食材是對健康最好的。這個概念正好適用於外來物資取得不易的鎖國體制時代。

<sup>14</sup> 濱野保樹，〈世界に模倣される日本の「衣食住」の原点は「身土不二」にあり〉（收錄於《サピオ》，2005年11月9日發行），20頁。

屹立於巨海之天險，是日本可以獨立於華夷體制之外，並以「中央之國」自居的先天條件（信夫清三郎：第一卷，1990：50-53）。

十七世紀萌芽的「日本主義」，到了十八世紀逐漸升級為日本的「國學」，而集大成者則是醫者出身的本居宣長。他試圖從反儒學的角度，強化日本主義對日本的重要性。本居宣長在其著書《馭戎慨言》中，前所未有地稱中華帝國為「戎」，中華的「妄自傲慢」心態是天地之間「無可與相比」的，並強調自鎖國體制完成後，日本「猶如春日明淨，山野花草繁茂」，又「遙遠各國皆來進貢」（信夫清三郎：第一卷，1990：56-59）。

同樣是對「華夷體制」展開批判，十八世紀的蘭學者新井白石，則注意到西方所強調「自主對等」的國際關係。雖然日本並沒有因此而走向開國之途，但在新井白石的推動下，十八世紀的日本在一股對抗「華夷體制」的思潮下，培養了一批蘭學者，他們不再強調「中央之國」是中華或是日本的絕對主義觀，而認為每個國家都可視自己為「中央之國」，從形式上對等的橫向關係重建對國際秩序的認知（信夫清三郎：第一卷，1990：60-64），也為近代「國家意識」的崛起埋下了伏筆。

## 參、近代「國家意識」的成形與建構

### 一、維新前後「國家意識」的成形

即使日本透過鎖國體制的完成，試圖在瞬息萬變的國際情勢中尋求自保，然而到了十八世紀後半，日本仍舊無法免除來自外部勢力的壓迫。日本列島四面環海，過去海洋可能是一道天險，但曾幾何時，外患幾乎隨時可藉由海岸線的任何一處就輕易上陸。政治上「地方分國」的型式已經不足以維護日本社會的整體安全，唯有以「統一國家」的型式，強化海防，問題才得以解決。

十八世紀末期，出身於本州東北仙台藩的工藤平助在意識到來自北方

外患的同時，完成了《赤蝦夷風說考》，針對俄羅斯勢力的南下，提出有效對策。他所提出的策略簡單的說，就是「增強國力」、「海防第一」。而增強國力的第一要務，莫過於開發蝦夷<sup>15</sup>（信夫清三郎，第一卷，1990：76-77）。

受到工藤的影響，與工藤交情密切的林子平先後完成了《三國通覽圖說》與《海國兵談》。林子平已經意識到「海國」日本的危機將來自於海上，因此海國之武備應該著眼於海岸線地區，而日本之兵學應從以內戰為主體的陸戰，轉換成以應付海外戰爭為主體的水戰。值得注意的是，林子平認為水戰的關鍵是大砲，因此主張在日本的海岸沿線設置大砲。換言之，《海國兵談》的概念仍舊停留在消極被動之陸戰兵談的自我防禦上，尚未考慮到透過海軍的建構，以積極主動的態勢迎戰海外「黑船」的攻擊（信夫清三郎，第一卷，1990：78-80）。

首次把日本列島的形象以統一的型式擘畫出來的，是同時期的蘭學者本多利明。面對外力的衝擊，不同於其他人的被動守備，本多以不同的「海國」認識，主張應該「向萬國派遣船隻，攫取所需物品及金、銀、銅運回日本，充實國力，乃海國必然採取之法」。換言之，本多的思想是站在經世論的觀點，向對手主動出擊。除此之外，他也注意到西方近代國家之競合關係中「開拓制度（殖民制度）」與「重商主義（以無用之物換取有用之物）」，所衍生出一種具有「統一」模式的「國家」（信夫清三郎，第一卷，1990：81-83）。本多的主張可說是日本對近代「國家意識」的思考雛型。

日本完成鎖國體制之後，在對外關係上維持了兩個世紀的承平歲月。然而，到了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來自外力的騷擾不斷，鎖國的策略運用越益困難。西元 1792 年俄羅斯的 Ekaterina 女帝派遣使節前來，要求通商交流。這讓幕政的操盤手松平定信也逐漸體認到唯有著手海防與學習紅毛之「理」，才足以應付來自西力的衝擊（信夫清三郎，第一卷，1990：95-96）。

<sup>15</sup> 蝦夷地分為「本蝦夷」（北海道）與「北蝦夷」（Sakhalin 半島）兩處。

過去幕府曾施以「外國船驅逐禁令（異国船打払い令）」，處理外國船的叩關，但終究只是消極而被動的一時之計。於是，儒學者會澤正志齋透過《新論》的發表，試圖提出治本之法。會澤的策略，無論是談國體、形勢、虜情（敵情）、防禦、與長計（長治久安之大計），基本上都是從「國家」層次的至高點，提出「一時」的因應對策。雖然會澤的思考的確有不少欠缺周嚴的地方，更沒有「民族主義」的特質，但卻為幕末的維新志士提供了另一個思考空間。然而，會澤所提出的幾個概念，例如，日本「國家」的危急存亡、「富國強兵」的概念、地方分國的「角色扮演」等，在日後皆成為維新志士尋求突破危機、改革現狀的思考選項（信夫清三郎，第一卷，1990：157-62）。

西元 1853 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官培理來航，要求日本開國。在培理的強硬態度下，幕府一反過去作風，翌年與美國簽訂了『日美和親條約』。面對美國的武力威嚇，1858 年日美之間又簽訂了非對等關係的『日美修好通商條約』。在一體均霑的原則下，幕府陸續與荷蘭、俄羅斯、英國、法國等列強也簽訂同樣內容的條約。面對前所未有的危機，從「佐幕·開國」vs.「尊王·攘夷」，到「公武合體·公議政體」vs.「尊王攘夷·討幕開國」，不同的議論與派系之間，相互對立（五味文彥、高埜利彥、鳥海靖，1998：307-13）。

西元 1867 年土佐藩的脫藩志士坂本龍馬從現實主義的角度考量，提出他的新國家構想，即有名的「船中八策」（加來耕三，2000：210-21）。套用現在的說法，一般認為坂本的理念，就是要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的近代國家。這也是日本社會萌生近代「國家」概念的開始。「船中八策」的八個理念在維新之後，最後都被明治新政府承繼下來。例如，第一策「天下政權應回歸朝廷，並由朝廷宣告政令」，西元 1867 年的「大政奉還」，實現了這項理念；第二策「設立上下議政局，內置議員參贊萬機，萬機依公議決斷」，西元 1890 年帝國議會的成立，落實了設立議政局的理想；第三策「招聘有才的公卿諸侯與天下人才，賜予官爵以為顧問，去除傳統有

名無實的官職」，西元 1885 年內閣制度的確立，讓天下有材者操盤國政；第四策「與外國交際應採納公議，並另立至當之規約」，西元 1899 年治外法權的撤廢，是落實這項理念的開始；第五策「折衷舊有之律令，新撰無窮之大典」，西元 1889 年大日本帝國憲法的頒布，完成了新撰法典之使命；第六策「擴張海軍」，西元 1872 年陸海軍省的設置，是軍擴的開始；第七策「設置御親兵，以守衛帝都（京都）」，西元 1888 年以貴族子弟組成近衛師團，完成守護都城的準備；第八策「金銀物價應與外國行平均之法」，西元 1911 年關稅自主權的恢復，可說是坂本夢想的完成（山本大，2003：145）。

從「船中八策」的理念中，清楚顯示促使日本社會一反過去根深蒂固的「地方分國」概念，從統合的近代「民族國家」的構想中試圖尋求外來危機的解套對策，西力的衝擊扮演了觸媒的效果。從近代「國家意識」建構的角度觀之，西力的衝擊既是危機，但也是推動日本走向近代化發展的重要轉機。

## 二、近代國家體制的完成

西元 1868 年明治新政府成立之後，新政府的行政權力可及之處，僅有幕府的直轄舊領、以及跟隨幕府之諸藩的舊領地而已，其餘區域所呈現出的仍是一片分國割據的局面。即使是那些迫使幕府「大政奉還<sup>16</sup>」，「王政復古<sup>17</sup>」的諸藩也仍握有兵力，繼續強化其對藩內的支配體制。對新政府而言，列島上諸藩勢力割據的局面是與歐美強權勢力抗衡的一大障礙。唯有建構一個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體制，打破過去諸藩封建割據的局面，改以近代民族國家的型態出現，才有可能達成與「萬國對峙」的目標（五味文彥、高埜利彥、鳥海靖，1998：319）。換言之，與「萬國對峙」的夢想，是近代「國家意識」建立的重要關鍵。於是，明治新政府開始斷

<sup>16</sup> 西元 1867 年 11 月德川幕府第 15 代將軍慶喜把政權還給朝廷。

<sup>17</sup> 西元 1868 年 1 月日本社會正式廢止合議制的武家政體，恢復過去的君主政體制。

行一連串內政上的行政革新，而每一個動作都在強化「中央＝國家」的觀念。

爲了破除現實上藩政割據的局面，西元 1869 年明治新政府首先向各地藩主提出「版籍奉還」的行政命令（五味文彥、高埜利彥、鳥海靖，1998：320），將諸藩對領地（版）與領民（籍）的權力歸還給天皇（＝國家），再由中央以國家的力量推動地籍與戶籍的調查事業（信夫清三郎：第二卷，1994：328）。爲了強化中央（＝國家）的力量，西元 1873 年透過徵兵制度，建立以國民爲基礎的國家軍隊（五味文彥、高埜利彥、鳥海靖，1998：322）。爲了有效推動國家的近代化發展，在提升民智爲第一要務的前提下，國民的啓蒙開化則是當務之急。於是，在開智治產之功利主義教育觀的基礎上，西元 1872 年公佈學制，推動國民的教育建設（五味文彥、高埜利彥、鳥海靖，1998：329、369-371）。爲了讓國際社會承認日本是近代民族國家，仿效列強行以憲法爲政治中心的「立憲主義」，立憲政治的確立也是當前之急務（瀧井一博，2004：17）。於是，西元 1889 年完成欽定「大日本帝國憲法」的公告（五味文彥、高埜利彥、鳥海靖，1998：348）。

雖然與「萬國對峙」的目標相當明確，但要整合與「萬國對峙」的國內體制，在推動的過程中必然會產生矛盾與衝突。在強迫諸藩勢力放棄其既有之「小權」，以完成國家之「大權」的過程中，自然會引起內部勢力的對立。因此，製造對外的緊張局勢，轉移「小權」的焦點一舉向外，是解決內部危機的一種方法（信夫清三郎，第二卷，1994：228），同時又可從「國家防衛線」的角度強化國家的獨立主權（入江昭，1998：30）。西元 1869 年「征韓論」的提出（毛利敏彥，1996：69），以及西元 1873 年「征台論」的提出（毛利敏彥，1996：57-58），都是試圖透過對外的緊張關係來消解國內的不滿情緒，但兩者在時機的掌握上顯然是不得要領。「征韓論」後來是胎死腹中（毛利敏彥，1996：118-21）；而「征台論」雖然是付諸了行動，但對財政貧弱的明治政府而言，這場戰役最後卻是得不償失（毛利敏彥，1996：170）。換言之，對外問題的引爆並沒有有效解決國內不滿

情緒的問題，反而使得問題變得更加複雜。西元 1874 年「征台之役」之後，國內對新政府的「國家」體制感到不平的士族、農民，頻頻起來反亂。這種現象直到西元 1877 年「西南戰爭」之後，才暫時沉靜了下來（信夫清三郎，第三卷，1994：77-80）。

明治政府自西元 1868 年成立以來，不斷地在跌跌撞撞的摸索過程中建構出日本的近代「國家意識」，而甲午戰爭的獲勝也可說是日本社會「國家意識」的正式成形。西元 1894 年甲午戰爭開戰之前，英國同意新訂日英之間『通商航海條約』，除了撤廢對日不平等條約當中的「領事裁判權」之外，並同意調整日本關稅稅率。在以英國為首的列強默認下，明治政府巧妙地掌握國內的人心向背，在舉國一致支持對外戰爭的態勢下，戰勝清國，並完成議和（中塚明，1992：195）。以一言蔽之，西元 1895 年馬關條約的簽定，基本上明治政府已經使民眾對「國家」存在的意義有了信心，維新以來國民希圖與「萬國對峙」的夙願已經踏出了第一步。

日本社會從「國家意識」的萌生轉換成「國家認同」的三項重要關鍵，即，西元 1889 年作為國家存立宣示之『大日本帝國憲法』的頒布，西元 1890 年作為國民教育基本法之『教育勅語』的宣告、以及西元 1895 年甲午戰爭的獲勝。憲法（constitution）制定的完成，日本乃得以向海內外展示國家政體的結構與組織（瀧井一博，2004：12-13）；『教育勅語』的頒布，則是透過意識型態的運作而成為憲法體制背後的支柱（田中彰，1999：99）；甲午戰爭的獲勝，象徵今後與「萬國對峙」、一雪被迫開國之前恥的可能性（林呈蓉，2005：15），是建構國民自信心以求取國家「開放與解脫」的開始，而這三者也是促使近代日本社會能統合成「民族國家」之三項不可或缺的要件。

### 三、「小國主義」與「大國主義」的抉擇

西元 1871 年 11 月，明治政府組了一支大型的使節團前往歐美訪察，除了正式宣告近代國家 = 日本已然成立之外，更重要的是為將來的「條約

改正<sup>18</sup>」施以預備交涉，以及對近代國家的文物、制度進行調查與觀摩（田中彰，1999：15），史上稱為「岩倉遣歐使節團」，這個使節團的海外活動共歷時一年十個月（田中彰，1999：21）。從任務達成的績效表現觀之，使節團在對外不平等條約的修訂案上可說是毫無進展，但在近代文明的觀摩學習上，對每一位成員而言都是大開眼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節團回國之後，負責隨團紀錄的權少外史久米邦武編修報告書《特命全權大使米歐回覽實記》（簡稱《實記》）百卷，分為五篇五冊出版。久米邦武把使節團在海外所目擊到的近代「文明」，一一紀錄下來，以廉價的政府出版品刊行，讓國內民眾有機會一睹為快，對海外事物能有所理解。

根據《實記》的記事內容與敘事篇幅可以推知，明治政府內部的政治領袖與其注意英、法等歐美大國，他們的視線似乎更集中在荷蘭、瑞士等歐美小國身上（田中彰，1999：38-39）。這個事實可以清楚說明，何以維新初期新政府學習仿效的對象會從英、法轉向新興的德意志帝國，特別是在憲法、軍事、以及醫學等代表近代「文明」的層面上。畢竟德意志帝國是源自於小國普魯士，西元 1871 年才搖變成大國，這對同時期在歐洲造訪的使節團而言，對日本今後發展上所不可預測的「潛能」，著實是一大鼓勵（田中彰，1999：51）。西元 1878 年《實記》出版之後，日本全國上下開始思索今後「近代國家＝日本」的可能形象（色川大吉，1976：51），進而引發朝野各界在「大國主義」與「小國主義」思惟上的路線爭議。

明治初期，日本社會對「大國主義」與「小國主義」的摸索與矛盾，可從當時的民權運動者中江兆民的著書《三醉人經綸問答》中，看出端倪。中江在書中設定了三個人物，一位是風采翩翩、言語清晰的哲學家＝洋學紳士；另一位是滿腦子的西洋近代思想，卻總是一身和服壯士裝扮的理想主義者＝東洋豪傑君；以及礙於大環境的阻撓，總是迂迴前進、謹慎行事的現實主義者＝南海先生。《三醉人經綸問答》就是以這三人在酒過三巡之後，相互交談、議論國家大計之一段虛擬對話，試圖描畫出近代國家＝

<sup>18</sup> 針對幕末以來幕府與列強之間所締結之不平等條約，展開修訂談判。

日本未來發展的可能性（田中彰，1999：81）。

《三醉人經綸問答》出書的時間點是在西元 1887 年，當時明治新政府對外有「條約改正」的談判；對內則是自由民權論者所主張的「三大事件建白運動」。對當時的有識之士而言，內憂外患的時代是他們表達對今後國家進路之構思與報負的絕佳時機（色川大吉，1976：51）。洋學紳士、東洋豪傑君、以及南海先生分別代表著當時日本社會菁英對國家社會的三種思考面向。洋學紳士在人類「進化」法則的基礎上，主張只有以「道義立國」來與西力抗衡，別無他法（色川大吉，1976：52）。在歐美帝國主義的壓迫下，東洋豪傑君則從「外征策略」上，強調應該走「大陸侵略、強兵富國」路線，否則只能坐以待斃（色川大吉，1976：54-55）。南海先生則以為，面對西力的衝擊，應該與東亞大國的清廷交好，以互救緩急（色川大吉，1976：56），不過南海先生的思考卻被紳士君與豪傑君嗤之以鼻，認為是無濟於事的論調。

《三醉人經綸問答》可說是把當時日本社會在「一身自由」、「一國獨立」、「世界和平」的共通理念下，突顯出「國權」與「民權」之間思考上的矛盾性。畢竟「世界和平」仍停留在夢想階段，當爭取「一國獨立」的同時，「民權」自然會受到壓縮；但是，追求「一身自由」之際，「國權」的存在勢必會被忽略。「國權」與「民權」之間如何找到一個平衡點，從明治初期乃至整個近代，甚至是戰後六十年的現在，日本社會仍舊停留在研究、摸索的過程當中。因此，中江兆民的《三醉人經綸問答》可說是日本近代思想中的一大傑作。

面對思想家之各種書桌上的論議，明治新政府在西元 1890 年已為「小國主義」與「大國主義」的論爭直接畫下句點。當時的山縣有朋首相針對日本的外交策略所提的意見書中，強調「國家獨立的自衛之道」就是確立並固守國家的「主權線」與「利益線」。「主權線」所指的是不容侵犯的國家領域；「利益線」則是出奇制勝以保持領域完整的鄰近區域，而朝鮮半島的獨立自主是日本「利益線」的焦點所在（芝原拓自・豬飼隆明・池田

正博，1988：81-86）。然而，朝鮮半島的情勢變化勢必會牽涉俄羅斯與大清國的發展動向，因此山縣有朋所提出的這份〈外交政略論〉，是確立了今後日本將朝往「大國主義」路線發展的一項重要宣示（入江昭，1998：32）。

西元 1894 年媒體人出身的德富蘇峰集結歷年在《國民之友》與《國民新聞》等雜誌上曾發表過的八篇文章，出版了大作《大日本膨脹論》（德富蘇峰，1974）。在前述「主權線」與「利益線」等國家防衛線的概念下，強調國家的外部膨脹與國民的海外雄飛是國家求取生存發展的必要過程，在這發展過程中除了歐美列強之外，日本勢必會與東亞大國的清廷發生衝突。事實上，西元 1894 年清·日之間甲午戰爭的爆發驗證了德富蘇峰《大日本膨脹論》的預言（林呈蓉，2005：13-16）。必須正視的是，它所代表的意義是「國權」的存在已然超乎了「民權」（田中彰，1999：103），「軍國主義·專制主義·國家主義」=「大日本主義」將凌駕於民眾的生活之上<sup>19</sup>。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伴隨明治時代藩閥<sup>20</sup>與元老政治<sup>21</sup>的凋零，以及戰後資產階層（*bourgeoisie*）與普羅大眾（*proletariat*）對立的深化，歐美世界標榜反軍國主義與強調民族自決等風潮的影響，「產業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小日本主義」意識在日本社會逐漸抬頭。同為媒體人出身，戰後分別任職首相的石橋湛山、以及「東洋經濟新報社」會長的三浦鍬太郎，可說是「小日本主義」的兩位主倡者。為了完成「小日本主義」，而得以走「小國主義」路線，石橋湛山所主張的「殖民地放棄論」可說是三浦鍬太郎之「滿州放棄論」<sup>22</sup>的延長。他們的論調試圖粉碎朝野上下對「大日本主義」的幻想<sup>23</sup>，徹底打擊維新開國以來的「大國主

<sup>19</sup> 媒體人出身的三浦鍬太郎在「大日本主義か小日本主義か」（《東洋經濟新報》）一文中，以「軍國主義·專制主義·國家主義」定義「大日本主義」的特質，而以「產業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定義「小日本主義」的特質。

<sup>20</sup> 維新時期活躍的薩摩、長州、土佐、肥前等藩（特別是前兩者）出身者獨占明治政府要職，形成政治派閥。

<sup>21</sup> 明治後期至昭和前期，重要國務都在維新時期元勳政治家的干涉下行使。

<sup>22</sup> 三浦鍬太郎，〈滿州放棄か軍備擴張か〉（《東洋經濟新報》大正2年1月5日號），1913年。

<sup>23</sup> 石橋湛山，〈大日本主義の幻想〉（《東洋經濟新報》大正10年7月30日、8月6日、8月13日號），1921年。

義」路線。戰後初期，石橋與三浦分別位居日本政界與媒體界之要職，而他們在大正年間（1912-1926）的主張已為戰後的日本將走「小國主義」路線埋下了伏筆。

西元 1916 年曾任職外務大臣的後藤新平發表了《日本膨脹論》一書，強調為了維持國家的生存發展，推展「大日本主義」普及於海外的重要性。然而，不同於德富蘇峰《大日本膨脹論》之透過戰爭手段達成國權擴張的目標（米原謙，2003：121-22），後藤新平則主張在「文裝的武備」後盾下，透過文化上的同化手段來征服其他民族。換言之，即以「王道之旗行霸道之術」（北岡伸一，1988：90-103）。

「小國主義」的思惟模式在 1920 年代從日本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的協調主義外交策略中，也可看出一些端倪。以「華盛頓體制」<sup>24</sup> 作為當時日本對外關係上的指標（入江昭，1998：86-87），即不惜以退讓來強化與歐美之間的經濟提攜、以及不干涉中國內政等作法（入江昭，1998：91-95），以「共存共榮」的全新觀念處理日本在國際政治中的定位（入江昭，1998：90-91）。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長期的慢性經濟不景氣<sup>25</sup>，迫使日本的社會氛圍從放棄以戰爭為手段來維繫國家安全與利益的思考，在昭和初期的 1930 年代突然一舉轉向軍國主義路線。「九一八事件」<sup>26</sup> 之後在中國引爆的一連串侵略事件背景下，西元 1933 年這種現象最先反應在小學生的國語課本上，開始為今後國民的「軍國教育」奠定基礎（田中彰，1999：148-53）。很明顯地，從 1930 年代開始日本又重新走向以戰爭為手段的「大

<sup>24</sup> 「華盛頓體制」是指西元 1921-1922 年「華盛頓會議」日美英法義等國之間所簽訂的幾項條約與協定的泛稱。比較重要的內容包括海軍軍力的軍縮限制、中國的領土保全與門戶開放、個別國家之間同盟關係的破棄等事項。

<sup>25</sup>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社會面臨了十年以上長期的經濟不景氣。戰後伴隨歐美經濟勢力回歸國際市場，1919 年開始了亞洲的戰後恐慌；1923 年發生關東大地震，日本經濟大受打擊；1927 年災後的金融、經濟問題正式浮上檯面，引發金融恐慌；1929 年美國華爾街股市崩盤所引發的世界性金融恐慌連帶影響了日本，而引發 1930 年日本社會的昭和恐慌。

<sup>26</sup> 西元 1931 年 9 月 18 日，以奉天（瀋陽）北方柳條溝鐵路爆破事件的契機下，展開了日本對中國東北的侵略戰爭，日本歷史上則稱之為「滿州事件」。

國主義」路線。

西元 1938 年之後，面對詭譎多變的世界情勢，日本政府提出了建設「東亞新秩序<sup>27</sup>」的論調，而西元 1940 年德、義、日締結同盟關係之後，更強化了東亞新體制的構想。然而，憑藉著與德、義的結盟關係而建構出的東亞新體制，邏輯上的矛盾促使日本的論調被視為是「痴人說夢」。從國際研究的角度觀之，日本政府打出以「八紘一宇」的精神，在「大東亞」盟主=日本的領導下，透過亞洲人的自我覺醒，排除歐美勢力，在亞洲建構一個獨立自主的政治圈與經濟圈，這個想法的原點是出自於德國地政學的國際觀（入江昭，1998：124-35）；但從歷史學的角度則認為，江戶日本以自我為中心的「大君外交」思想重新在近代「東亞新秩序」的概念上復辟。

## 肆、結語：以「Made in Japan」的品牌意象取代「國家意識」

日本岩波書店出版的《廣辭苑》裡，「くに（=国・邦）」的語辭解釋有「國家、國土」的意涵，但同時也有相對於中央之「地方、地域」的意涵在。縱觀日本兩千年的歷史，多數的時候在日本人的腦海裡，地方「分國」的概念是凌駕於統合「國家」的概念之上，而統合「國家」概念之崛起，則是源自於「海內 vs.海外」的相對觀。根據內田善一郎氏<sup>28</sup>的論點，對日本人而言，具有近代民族國家的體認，充其量也不過是近一百年的事。與其談抽象、遙遠的民族國家之「國」，在自己生活周遭非常具體的村落、鄰里（町內會）所結構而成的故里之「國」，對一般民眾的生活而言，更具有其實質上的意義。因此「國家意識」必須透過知性的訓練，才有可能

---

<sup>27</sup> 爲了促使中日戰爭能早點結束，西元 1939 年，日本提出由日、中、滿三國締結聯盟關係，相互提攜，並在日本的武力後盾下削減或驅逐盤據在東亞地區的歐美勢力。

<sup>28</sup> 內田善一郎，松下政經塾第 25 期生。

被建構出來<sup>29</sup>。而憲法的頒布（帝國憲法）、國民教育基本法的推動（教育勅語）、以及國民自信心的建立（甲午戰爭），則是戰前日本建構「國家意識」的重要手段。

然而，西元 1945 年日本戰敗之後，在美國的主導下日本社會開始走向「去軍事化」與「民主化」路線。過去建構「國家意識」的元素，無論是欠缺天皇之於國家之責任論述的「日本國憲法」、或是忽略東洋傳統家族倫理的「教育基本法」，都不是根據日本的國體本質所量身打造的，這些問題在戰後六十年愈益凸顯其嚴重的不自然與不適用性。鑒於憲法第九條日本不得參與海外戰爭的規定，戰後日本的國民自信心，從「戰爭」手段的海外擴張，轉換成「Made in Japan」製品的國際聲譽。值得注意的是，在扭曲的憲法與教育基本法之下，日本民眾的「國家意識」逐漸淡然。最重要的是，戰敗的結果，「國家意識＝戰爭」的圖式深刻烙印在民眾心底。1970 年代以後，「Made in Japan」的品牌意象逐漸取代「國家」，而成爲日本社會共通的識別圖騰。

西元 1980 年代以前，日本社會努力地從戰爭的廢墟中活下來，國民生活的目標是如何在海外打響「Made in Japan」的品牌。然而，當「Made in Japan」的品牌標章開始行銷全球之後，國際社會要求日本回饋的聲浪日益高漲，問題是執行這些要求的同時，很多時候會與現行「日本國憲法」的精神相牴觸，更重要的是爲了日本自己以及亞太地區的區域安全，在「日美安保條約」的架構下，日本是否應該走向「大國主義」路線，成爲社會各界議論的焦點。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日本社會面臨著難解的困境，而問題的根源出自於「日本國憲法」的虛構性論述。特別是憲法中「天皇」、「戰爭放棄」、以及「國民的權利與義務」等部分。在憲法相關「天皇」的條文中，是否天皇可被視爲是國家元首，並沒有明確標示，這導致在國家責任的釐清與

<sup>29</sup> 內田善一郎，〈日本人の国家意識の行方〉（松下政經塾《2005 年度月例レポート》），收錄於網址 <http://www.mskj.or.jp/profile/uchida.html>，2005 年 10 月。

外交儀式的行使上，首相或天皇之於國家的定位變得曖昧不清<sup>30</sup>。在憲法「戰爭放棄」的相關條文中，明確規定日本將永久放棄海外戰爭。然而，西元 1991 年「波斯灣戰爭」發生當時，在美國的壓力下，日本負擔了 150 億美元，並派遣以自衛隊所組成的國際維和部隊（PKO）前往波斯灣進行掃雷作業。從此以後，在柬埔寨、莫三鼻給、盧安達、戈蘭高地、東帝汶、阿富汗、伊拉克等地，舉凡有國際紛爭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日本維和部隊活躍的身影<sup>31</sup>。然而，即使是出自於人道的復興救援，應可勤稱是別具國際貢獻的行動，但這是否已經涉及公然違憲、違法，仍有待社會各界的公評<sup>32</sup>。顯然地，明治百年以來的國家路線問題並沒有被有效解決。而憲法「國民的權利與義務」之相關條文中，強調國民應該是以一介的個人而受到應有的尊重，在這同時日本社會傳統的家族倫理價值全然被漠視。換言之，國民的自由與權利不斷被凸顯的同時，責任與義務的部分卻被嚴重忽略<sup>33</sup>。

在無視於傳統與歷史前提下所結構出來的「日本國憲法」，也間接誤導了「教育基本法」的內涵。日本現行的「教育基本法」承襲「日本國憲法」的精神，在強調個人價值的同時，也抹煞了家族的倫理價值，更遑論是「國家意識」。「國家意識」的闕如已經成為日本社會不容忽視的嚴重問題。西元 2005 年中國的反日示威遊行、以及北朝鮮的日本人拉致事件等外部壓力運作下，「國家意識」的重建已成為日本教育界當前之要務。今年（2006 年）四月底，日本自民與公明兩黨召開「教育基本法」修正案的檢討會，在大島理森元文相的主持下，會議中做出決定，即在「教育基本法」的內容中加入「尊重傳統與文化，熱愛養育我們的國與鄉土（伝統と

<sup>30</sup> 大前研一，〈首相なのか天皇なのか？「この国の国家元首は誰か」の大議論を始めよう〉（《サピオ》第 239 號），小學館，1999 年 11 月 24 日發行，23-25 頁。

<sup>31</sup> 參照防衛廳・自衛隊網站 <http://www.jda.go.jp/katudou.htm>。

<sup>32</sup> 參照阪南中央病院勞動組合網站 <http://www.jca.apc.org/stopUSwar/index.html>。

<sup>33</sup> 桜井よしこ，〈憲法改正を發議する〉（《サピオ》第 377 號），小學館，2005 年 11 月 9 日發行，83-86 頁。

文化を尊重し、それらをはぐくんできた我が国と郷土を愛する)」、以及「尊重他國，培養貢獻國際社會和平與發展的態度（他國を尊重し、国際社会の平和と発展に寄与する態度を養う）」等文句。如果這個修正案能在國會被通過的話，也是自西元 1947 年「教育基本法」制定以來首次的修訂。

問題是當初自民黨所主張應該在教育基本法的內容中明確加入「愛國心（国を愛する心）」的想法，與公明黨所主張的「以國爲重（国を大切にす）」的意見嚴重對立。對公明黨而言，「愛國心」會令人聯想起戰前的國家主義、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執政的自民黨不得已乃改以「尊重傳統與文化，熱愛養育我們的國與鄉土」等文句，強調這裡「國」的範圍是不包括統治機構的部分，雙方總算有了共識。換言之，公明黨的疑慮是，「愛國心」的「國」是執政自民黨主政下的「國」。然而，「養育我們的國與鄉土」語句當中的「國」，到底是「鄉里」之「國」，抑或是「國家」之「國」，基本上是在語焉不詳的情況下相互求得妥協。顯然，在朝野汎政治化的對立過程中，日本「國家意識」的重建之路，仍舊困難重重。

『教育基本法』當中有關教育行政的部分，開宗明義地強調「不必服從不當之支配（不当な支配に服することなく）」，自民黨認爲這段文句語意模糊，要求刪除，但在與會人士反對下仍舊被保留了下來。太平洋戰爭挫敗的結果，民眾視「國家意識」如洪水猛獸。然而，面對北朝鮮的日本人拉致事件（1977-）<sup>34</sup>、或因「竹島問題」的領土爭議所引發的南韓反日運動（島田洋一，2005：7-9）、甚至不斷增築中已超過五十座的中國「反日紀念館」（酒枝響子，2002：16-20）、與中國的反日示威遊行（2005）（渡邊隆，2005：22-24）等外交上的紛爭，日本政府卻無法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充分凸顯出二十一世紀初期的日本正困在「文化的大國主義」與「國際政治的小國主義」之夾縫中苟延殘喘。

逆向思考 1880 年代《三醉人經綸問答》中日本社會對於日本之於國

<sup>34</sup> 參照フリー百科事典《ウィキペディア（Wikipedia）》網站，<http://ja.wikipedia.org>。

際社會的角色期待，沒有「世界和平」就難以「一國獨立」，沒有「一國獨立」就無法「一身自由」。從西元 1991 年泡沫經濟瓦解以後，日本一直陷在經濟金融低迷的桎梏當中。然而，從去年（2005 年）下半季開始，海外的資金一股腦兒地往日本市場回流。不同於過去是因為「賤賣」所以才被外資企業併購（鈴木雅幸等，2004：28-43），在日圓升值所造成產業空洞化的危機中，日本社會長期瀝練出來的產業技術，是受到外資青睞的主因。日本傳統上技術走向大眾化的社會特質與職匠精神，是戰後日本得以「技術立國」而傲視全球的力量泉源（鈴木一義，2005：22-24）。伴隨日本景氣的曙光再現，當日本文化的「武士道」（笠谷和比古，2005：16-18）、「浮世繪」（三井秀樹，2005：30-32）等國粹文化成爲今天歐美社會矚目的焦點時，日本國民重新從傳統歷史、風土的角度尋求自信，今後日本是否能再度拾回在亞洲的主導權，端看「國家意識」是否能凌駕於「Made in Japan」的品牌意象之上，而修訂一部能夠充分反映國體特質的「日本國憲法」將扮演著關鍵力量的角色。

## 參考書目

- フリー百科事典。2006。《ウィキペディア (Wikipedia)》網站 <http://ja.wikipedia.org>。
- 入江昭。1998。《日本の外交》。東京：中央公論社。
- 三井秀樹。2005。〈ゴッホ、モネからエルメス、ティファニーまで世界が模倣する「日本人の美意識・自然観」〉《サピオ》第 377 號，頁 30-32。東京：小學館。
- 三浦鍬太郎。1913。〈満州放棄か軍備拡張か〉《東洋經濟新報》大正 2 年 1 月 5 日號。
- 石橋湛山。1921。〈大日本主義の幻想〉《東洋經濟新報》大正 10 年 7 月 30 日、8 月 6 日、8 月 13 日號。
- 久米邦武編，田中彰校注。2003。《特命全權大使米歐回覽實記》(全五卷)。東京：岩波書店。
- 大前研一。1999。〈首相なのか天皇なのか？「この国の国家元首は誰か」の大議論を始めよう〉《サピオ》第 239 號，頁 23-25。東京：小學館。
- 山本大。2003。《坂本龍馬》。東京：實業之日本社。
- 中塚明。1992。《『蹇蹇録』の世界》。東京：みすず書房。
- 五味文彦、高埜利彦、鳥海靖。1998。《詳説日本史研究》。東京：山川出版社。
- 内田善一郎。2005。〈日本人の国家意識の行方〉(松下政經塾《2005 年度月例レポート》)，收錄於網址 <http://www.mskj.or.jp/profile/uchida.html>。
- 毛利敏彦。1996。《台灣出兵》。東京：中央公論社。
- 加來耕三。2000。《坂本龍馬の魅力学》。東京：講談社。
- 北岡伸一。1988。《後藤新平》。東京：中央公論社。
- 司馬遼太郎。2003。《歴史と風土》。東京：株式會社文藝春秋。
- 田中彰。1999。《小國主義－日本の近代を読みなおす－》。東京：株式會社岩波書店。
- 米原謙。2003。《徳富蘇峰》。東京：中央公論社。
- 色川大吉。1976。《明治精神史》下。東京：講談社。
- 防衛廳・自衛隊網站。2006。 <http://www.jda.go.jp/katudou.htm>。
- 阪南中央病院勞動組合網站。2006。 <http://www.jca.apc.org/stopUSwar/index.html>。
- 松尾尊允編。2005。《大日本主義か小日本主義か 三浦鍬太郎論説集》。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
- 林呈蓉。1998。《前近代日本對外方針之研究》。台北：稻禾出版社。

- 林呈蓉。2005。《近代國家的摸索與覺醒～日本與台灣文明開化的進程》。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 芝原拓自・豬飼隆明・池田正博校注。1988。《對外觀》。東京：岩波書店。
- 信夫清三郎著，周啓乾譯。1990。《日本近代政治史》第一卷。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信夫清三郎著，周啓乾譯。1994。《日本近代政治史》第二卷。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信夫清三郎著，呂萬和譯。1994。《日本近代政治史》第三卷。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桜井よしこ。2005。〈憲法改正を發議する〉《サピオ》第377號，頁83-86。東京：小學館。
- 後藤新平。1924。《日本膨脹論》。東京：大日本雄辯會。
- 島田洋一。2005。〈韓国国会図書館「日本歴史歪曲展示会」扶桑社版教科書の呆れた「歪曲展示」〉《サピオ》第364號，頁7-9。東京：小學館。
- 班固。1976。《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台北：鼎文書局。
- 荒野泰典。1989。《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 酒枝響子。2002。〈大陸全土1直轄市14省2自治区にまたがる「抗日スポット55はまだまだ増殖中」〉《サピオ》第294號，頁16-20。東京：小學館。
- 笠谷和比古。2005。〈「日本型能力主義」のルーツ、「武士道」こそ新たな世界標準になる〉《サピオ》第377號，頁16-18。東京：小學館。
- 陳壽。1965。《魏書》卷三十〈倭人傳〉。台北：中華書局。
- 渡邊隆。2005。〈「日貨排斥」を叫ぶ反日デモ隊は日本製品で“武装”されていた〉《サピオ》第364號，頁22-24。東京：小學館。
- 新村出編。1987。《廣辭苑》第三版。東京：岩波書店。
- 新訂増補國史大系。1985。《令集解》前編。東京：吉川弘文館。
- 新訂増補國史大系。1985。《令集解》後編。東京：吉川弘文館。
- 鈴木一義。2005。〈江戸時代に培われた「技術の大衆化」こそ技術立国・日本のものづくりの核心だ〉《サピオ》第377號，頁22-24。東京：小學館。
- 鈴木雅幸等。2004。〈外国人投資家は日本を買い続けるのか〉《週刊東洋經濟》第5894號，28-43頁。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
- 網野善彦。1996。《続・日本の歴史をよみなおす》。東京：筑摩書房。
- 徳富蘇峰。1974。《徳富蘇峰集》。東京：筑摩書房。
- 濱野保樹。2005。〈世界に模倣される日本の「衣食住」の原点は「身土不二」にあり〉《サピオ》第377號，頁20。東京：小學館。

魏徵等撰。1974。《隋書》卷八十一〈東夷傳倭國條〉。台北：洪氏出版社。

瀧井一博。2004。《文明史のなかの明治憲法》。東京：講談社。

Ronald P. Toby（速水融・永積洋子・川勝平太，譯）。1990。《近世日本の国家形成と外交》。東京：株式會社創文社

# Japan's Nation Consciousness Building: Discussion and Review of Japa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Climate

April C. J. Lin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and Department of History  
Tamkang University, Tamsui, Taiwan*

## Abstract

Reviewing the beginning of nation consciousness from history and climate in Japanese society, and the process of making people to acknowledge her existence,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ore the vein and valuation of nation consciousness in Japanese society.

After World War II, most of Japanese often connect the concept of “nation” with “war” because of battle defeated, sometimes “patriotism” be viewed as a taboo in Japan. Following the globalization of Japanese economy and unsettlement in Far East Asia diplomacy, how to reconstruct people's nation consciousness will be an important issue in Japanese society during the 21st century.

**Keywords:** nation consciousness, history, and climate